

棗陽一中上學記

衛光立

作者簡介：

民國 31 年（1942 年）生於棗陽太平區。
棗陽師範學校畢業。曾在人民解放軍服役至正團職專業。
後在襄樊市地方誌辦公室任職，已退休。
曾主編《襄樊市誌》及多部地方文史書刊，
著有《燃燒的夕陽》等多部文學作品。
育有三女。現住襄陽。

1955 年的夏天，我作為棗陽縣太平區湖河鄉雞籠寺小學的首屆畢業生，在楊壩考場，參加中考，幸運地被棗陽一中錄取，成為包括我在內，我家所在的陳河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同時考上中學的三名學生之一。

這年的 9 月 1 日，父親約其他兩位同學的家長一起，送我們到棗陽一中上學。這天早上父親背著用包單裹著的被子，我穿著母親為我趕制的新衣、新鞋上路了。

縣城離我家五十華里。那時候出行，既沒有汽車坐，也沒有自行車騎，全靠兩條腿「步量」。但我的興致很高，一



路上跟在大人後面，和其他同學說說笑笑，不到中午就到了學校。那天來報到的人很多，在別人的指點下，我們在醒目處看到張貼的紅榜，並從 1955 級（4）班新生名單中，找到了我的姓名。接著很快辦完相關手續，我正式成為棗陽一中一名學生。

棗陽一中是歷史上辦學最早的一所中學。其前身「福興中學」是 1923 年美國基督教徒何伯納牧師與棗陽基督徒熊金相、熊金印兩兄弟共同創辦的一所私立教會學校，校址在城關鎮南街洞陽觀公房，後因故停辦。1932 年 9 月，民國元老馬伯援先生任棗陽縣長後，倡議在縣城箭廳復辦私立中學，承福興中學之遺緒，並以「復興」為校名，親任復興中學董事長。次年五月因受排擠，馬伯援下野，復興中學亦停辦。民國二十七年五月新市李樓財主李福安病逝，其遺產悉數捐資興辦私立「福安中學」，校址設在李宅，校長衛敬業。次年校址遷雙河鎮。其後因戰火頻仍，時局不穩，學校停停辦辦，直至 1947 年棗陽解放後，在新政府的努力下，學校得以恢復，並定址於城關鎮順城灣江西館，後迅速發展為棗立一中學。1955 年因增棗陽二中，棗陽縣立中更名為「棗陽第一中學」。我入校時棗陽一中的校區已有較大擴展，從江西館向北延伸大約五十米左右，有一道丈餘，高的土牆一間有幾棟平房是學生的宿舍區；土牆以北東半邊是飯場和老師宿舍，西半邊有三棟平房是教學區。上下課敲擊的大鐘就架在土牆上。學校的北大門外是一片寬闊的大操場。緊挨著操場就是種植著各種蔬菜的北園。一出學校門東大門，有一大溝直通沙河。那條河就是學生們的「天然臉盆」。

我剛從枯崗禿嶺來到縣城，感覺天更高能了，地更擴了，水更清了，樹更綠了，一切都新奇，一切都新鮮。縣城的馬路寬得能過一輛馬車，兩邊還有富餘，不像湖河鎮一輛板車就能把街面塞滿；路面上都鋪有細沙和小石子，下雨天走起路來也不會一腳下去捅多深，拔起來帶出滿腳泥；教室裡前

後牆都裝有玻璃窗，光線比原來小學教室亮堂多了；晚上自習用的是氣燈，也不用再點小煤油燈了。

我很快地融入同學中，與他們一起上課、下課、吃飯、睡覺，與他們交換各式各樣的見聞，分享著學生時代的快樂。但是「百裏不同風，十裏不同俗。」不同地域的人聚在一起，差別就出來了。棗北來的學生別說跟城裡人比，就是和棗南的學生比，也顯得「侷裏侷汽」。棗南山青水秀，柴方水便，棗北枯崗禿嶺，缺水少柴；棗南以吃大米為主，棗北主要吃高糧、紅薯；棗南盛楚風，棗北重唐（河）俗，等等。特別是我家居住之地，因是省縣邊緣地帶，更加原始封閉，「原生態」的成分保留得更多一些，更「土」一些，更「鄉巴佬」一些。別的不說，就從我的「個人形象」而言，也可以說是更加「特色顯著。」

先說這個「頭」。中國人對「頭」的變化是最敏感了。近百年來從留辮子。剪辮子、蓄長髮、剃光頭，到理各式各樣的髮型，無不反映出一個時代的變化，一種潮流的興起。也許我的家地處太過偏僻，更趨因循守舊，每每在這種「頭型」的變化上，更是慢半拍。記得我小時候，腦袋上與大人光頭不同的地方，就是窗門處留一張怪頭髮，叫「木梳鬣」，其他地方替得光光的。別家小孩也一樣，有的甚至在後腦勺處留一小辮。到發蒙時，也有到十二歲的，頭上所留頭髮全都剃光，整天頂著個大光頭。我入學前，父親怕我到後找不到地方剃頭，專門領著我請剃頭師傅把頭剃光。這溜光可鑿的頭，不能不說有點落伍了。

再說這衣著。解放以後農村開始流行穿「洋布」，服裝樣式也有「列寧裝」、「中山裝」、「學生服」等。但那時我家裡窮，買不起「洋布」，也捨不得請裁縫製作，所有的衣服全靠媽媽的兩支手縫連，所以不大講就穿戴。特別是男孩子，能將就將就。記得我上中學前每到夏天一般就是一條褲衩就打發了，每次洗澡把褲衩下來在水中搓一搓，塔在岸上

曬著，等澡洗完了，褲衩也曬乾了，再穿上。外出時拿一塊寺方包擔往背後一披，上面的兩角繫結在胸前，既遮陰，又涼快。我入學前母親特地為我趕著縫製一件白色的對襟短褂和一條在土染坊染的靛藍褲子——這還是花實施統購統銷前，用自家地裏收的棉花加工紡織而成的土布。褂子的樣式，可以說是現在流行的唐裝的「老祖宗」，當然沒有唐裝的美觀。可身和作工講究。褲子腿短而寬大，還上了一個大褲腰，穿上去要打個大摺，再用褲帶繫上。腳上穿的是當時農村流行的淺口布鞋。那裝束往人堆裡一站，當時就顯得很「文物」。

最後要說這口音，那更是「特色鮮明」。棗陽語音屬漢語北方方言的西南次方言，「語音清略帶秦」。但區域性很強，縣城南北差異較大，棗北豫音很重，而且言詞很短，語音生硬，說起話來一斧頭一鑿子，落在地下，能砸下個坑。譬如把「湖河鎮」說成「火鎮」，把「昨天下午」說成「夜後半」，把大事不好表述為「烹了」，把欺騙人表述為「臊人」，把開玩笑表述為「打渣子」，把「出風頭」表述為「燒哩」等等。我曾在報紙上讀過一篇介紹方言俚語的文章，裏面有一段對話，活活就是我們那塊人說話的「翻版」，現茲錄於下：

甲：是老表嗎？喊一崩子（一陣子）不搭理。

乙：只顧賣野眼（往別處看），沒吁故（沒注意）。聽說你年時個（去年）就來了，住啥個地界（地方）？

甲：是誰發箇癩啦（說夢話）！我夜裏（昨天）才來，活可好作？

乙：噯！見天（每天）從早起（早上）幹到黑麻眼（天黑漆），一目愣睡到天明（一睡到天亮），使（累）死了掙不了幾個錢。多晚儿（啥時候），去俺那裏吃篇食（餃子）？

甲：後黑（後天晚上）去，放不嘶氣（變質發酸）吧？

隨著人們社會交往的頻繁，活動範圍的擴大，現在家鄉

的年輕人，一般都不再操有這樣的口音了。但上了年紀的人，口音是很難改變的，這就是有別於棗陽四鄰八鄉的「特色語言」。

好在那個年代提倡「誰受誰光榮」。同學之間除偶爾互相取笑之外，並沒有歧視現象。但它卻讓我知道像我這樣的家庭是何等貧窮，送我上學是多麼的不容易！從此我懂得了珍惜每一分錢，懂得了如何努力學習去報答父母。

那時學校條件非常艱苦。從住說起。男學生統一住三開間的大寢室，所有寢是全都是上下兩層架著木板的大通舖，木板上舖一層稻草。每個寢室安排兩到三個班的學生，每個學生只能分到「一睡」之地。睡覺時，一人有動靜，眾人受甘擾；上舖翻身，下舖落塵。我入學時只帶了一床被子，睡覺時舖半邊蓋半邊。天氣漸漸冷了，一床被子顧得了頭，顧不了腳。實在受不了，我就找個同學合作，一床被子用作舖，一床被子用作蓋，兩人「通」了一個冬天的「腿」，將就渡過了第一學期。

再說吃的。剛入學時學生的伙標準是每月六元錢。到了二年級，每月漲到七塊二角。基本上是每天早上吃稀飯，中午乾飯，晚上或麵糊湯麵或稀飯，有時也吃饅饅。菜無非是鹽水煮冬瓜、煮蘿蔔、煮白菜等各個季節最便宜的大路菜。每頓開飯前，工人師傅按各班次就餐人數先分好菜飯，然後把飯桶和菜盆依次抬到飯場四周。開飯時，各班按照劃定位置，在各自的飯桶前排好隊，依次盛飯；按事先編好的席，由席長端一盆菜放在指定位置，八個人圍蹲一圈。等到全班所有的人盛罷飯、就了席時，生活委員一聲令下：「開動！」這時飯場裏是一片狼吞虎嚥聲，看誰能先搶吃完第一碗，盛到第二碗；不少人為了搶到第二碗，真是費盡心機；有的為了節省時間，吃第一碗時不吃菜，有的盛第一碗時專門不盛滿，以便以最快速度吃完地一碗，搶勝第二碗；有的一邊不斷地往嘴裡送飯，一邊死盯著飯桶，估磨著所剩數量，以便

以最快時間「出擊」，使第二碗飯不落空。總之，飯場中每天早、中、晚三餐飯，絕對是校園裡一道空前絕後的動人風景。

洗刷也不方便。入學時很多同學像我一樣，就是帶一條抹臉的手巾。一年中除了天寒地凍時，早上能在開水房裡，分到一瓢溫水洗臉外，一般都是把沙河當「臉盆」，在那裏解決洗滌問題。好在那時我們這些人，都非常不講究，從不刷牙，天冷了也不洗腳、洗澡，就這樣對付著過來了。

這樣的條件對家境貧寒的我來說，並沒有感到苦到那裏去。相反的，倒是認為學校有大米、白麵吃，這已經是很不錯的生活了。只是每次回家拿的錢，不到十天半月就吃光了，常常為沒有錢吃飯而發愁。記得有一次，我繳的飯錢只能吃到星期五。當時學校有規定，學生請假，必須在星期六下午離校，星期日下午到校。這樣一來，星期六的早餐和中餐就沒了著落。好在我口袋裡還有兩分錢沒捨得用。開飯時我瞞著班上所有的同學，溜到北園菜地裏，用這分毛錢買了一個大青蘿蔔，臨時解決了肚子的「空虛」問題。

時間一天天的流逝，第一個學期總算熬過去了。

1956 年春節前後，我家所在的陳河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升級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生產資料全部變為集體所有。這之前，1953 年開始國家對糧食油料實行統購統銷，取締私營糧行，禁止糧食自由買賣。1954 年又開始實行綿布統購統銷和棉花統購，城鄉居民銷費用布，實行憑購布證供應。接著國家頒布了農村實行糧食定產、定購、定銷和油量實行全購全銷政策，城鎮居民開始按計劃憑糧票購買糧食。在這種情況下，家裡實在沒有任何可以變賣的東西為我籌措上學費用，初中僅上了一個學期，我不得不輟學了。

1956 年春節後大約不到一個月，一天我正在東大溝撿柴，突然村里一個小孩跑來喊我說：「你們學校來了一位老師，正在家裡等你，你伯叫你快回去。」我不知來的是哪位

老師，也不知為何而來，只得急忙把剛刮的一片柴草，抖淨攬起，裝在匡中，揹著回到家中。

那位老師正坐在堂屋與父親說話，見我回家她很客氣地對我說：「學校已開學二十天了，你趕快準備準備上學去，課程耽誤多了會趕不上的。」最後他還特地交代了一句：「你們倆情況我回學校後，會你們班主任說的。」這位老師沒有代過我們班級的課，但我知道他姓劉，是一位數學老師。此時我不知如何回答老師，愣愣地站在那裏，由著父親與他應酬。

老師走後，父親經過認真考慮，終於做出決定，讓我直接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貸款上學，這位社長的弟弟與我一起同時考上中學，這個學期他弟弟已經上學走了。按照父親的安排，第二天一早我就來到社長家。社長見到我後沒有說更多的話，給我寫了個條子叫我到信貸社貸了兩塊六毛錢的款。就這樣我又回到學校。

我的班主任姓陳是位非常和善的老師。他見我又回到學校，非常高興地說：「你家的情況劉老師回來後，對我說了，我們準備商量一下，過兩天對你評點助學金。你趕快把耽誤的課補上。」果然很快我被批准享受乙等獎助學金，每月五元錢，一直到初中畢業。

一晃到了三年級，這年（1957年）秋天，平靜的校園不再那麼平靜了。學校黨組織號召教師幫助黨整風，大鳴大放提意見。運動是怎麼進行的，作為學生我們並不知情。後來學校開始張貼大字報，而且鋪天蓋地，越來越多。內容涉及方方面面，有的言辭越來越尖銳。那時我們政治上懵懵懂懂，分不清你是我非，只是課餘時間哪裡大字報多就往哪裡鑽，到處跟著看熱鬧，特別是關心自己熟悉老師的大字報。有一張大字報我得特清楚，它是教我語文的王老師寫的，題目是《「陳世美」何其多》，內容無非是說有的領導幹部進城後，拋棄了家鄉的妻小，又另娶新歡。

大概是為了保證反右派的鬥爭的順利進行，很快學校提前放寒假了。第二年春季開學後，我一回到學校，就發現學校裏盡管風平浪靜，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一樣，但氣氛顯得特別沉悶，沒有了歡聲笑語，沒有了滿面春風，很多熟面孔老師不見了。上面提到的寫《「陳世美」何其多》大字報的王老師，聽說被劃為「極右」，送農場「勞改」去了。原來穿著運動衣，從早到晚不離開運動場的代體育課的陳老師，因戴上「右派」帽子，也不見身影了。還有一位姓韓的音樂老師，依然還在教音樂。但那音樂課上的如同留聲機一樣沒有一點生氣，全沒有了過去那種風趣幽默、活潑歡樂的課堂氣氛。一打聽原來他是個留用「右派」。據後來的有關資料載，棗陽一中在這一次的整風反右鬥爭中，有十一位老師被定為「右派」加「反革命」分子，有十人被劃為「右派」分子，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些人才得以平反。

